

生态女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联盟^{*}

乔安娜·奥克萨拉 著 林 策 译

[内容提要] 本文批判性地评估了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之间不同的理论联系方式,以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现有传统为出发点,概述了唯物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环境的破坏之间的联系。与早期那些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联进行理论化的尝试相比,本文展现了上述立场的政治和理论优势,但也对它们进行了哲学批判;主张对部分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分析框架进行一定的更新,以更加精确地解释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自然资本化机制。这些机制在今天已经变得十分突出;女性主义与环保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存在共同的目标,迫切地需要联合起来。

[关键词] 女性主义 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生态 政治联盟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70年代,当时新兴的大规模环保运动与女性主义等各种社会正义运动交织在一起。198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持续发展,并对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压迫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①然而,到了1990年代,它开始因其本质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倾向而受到激烈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并没有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尝试以生态的观点补充和纠正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这反而使其几乎

成为了笑柄。正如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格里塔·嘉德(Greta Gaard)所写的那样“生态女性主义者开始被视为极端反智的女神崇拜者,

* 本文原载《希帕提亚:女权主义哲学杂志》(*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2018年第2期,原文题目为《女性主义、资本主义与生态学》(“Feminism, Capitalism, and Ecology”)。

① 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基础性资料,参见 Mary Daly, *Gyn/ 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Susan Griffin,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她们错误地把地球描绘成女性,并对全世界发出了集权式的、罔顾历史的素食主义命令。”^①

然而,基于政治和理论上的原因,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在今天显得至关重要。首先,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可行的女性主义批判必须直面我们正在经历的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问题,尤其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可以说是当今人类正在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因此,任何政治运动都不能忽视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果女性主义不认真地参与环保,并思考其与环保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很难认识到它是一种相关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将在21世纪以一种颇具意义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未来。

其次,学术界的理论发生了转变:环境问题不再被认为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当今大多数环境问题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意义。环境问题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性别意义,并对性别平等产生具体的政治影响。气候正义、粮食安全和能源正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如此:它们既需要生态主义的分析,也需要女性主义的分析。因此,可以断言,在当今人文和社会科学针对环境问题的不断讨论中,女性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声音。

再次,通过当代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条将女性主义与环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光明之路正在浮现。当前,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达成了如下共识:资本主义是理解当代女性从属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关键框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此前几十年,‘资本主义’这个词几乎不再出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外的其他人的著作中;如今,形形色色的评论家公开表达对资本主义可持续性的担忧,而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则动员群众反对这些评论家的做法。”^②弗雷泽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转型或政治时尚,而“是一种日益形成的社会直觉,这种直觉认为,一切异

质性的社会弊病——在金融、经济、生态、政治、社会等领域围攻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结构性基础。未能关注这一基础的改革注定会失败”。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说的复兴为重新审视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理论联系开辟出了一条有趣的途径。

本文的目的在于为上述研究打下哲学基础,为此将通过四个阶段分别进行论述。首先,本文将以现有的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传统为出发点,概述使资本主义、女性的从属地位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这三者之间联系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方式。然后,本文区分了以经验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后者提出了针对资本主义、性别压迫和环境破坏之间的联系的结构性主张。这两种理论立场简化了更复杂、更多样化的讨论,这里的讨论仅仅是批判性地审视为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辩护的不同哲学依据。在第三部分,本文将论证有必要更新部分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分析框架,以解释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自然资本化的机制,这些机制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最后,本文将总结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当代政治联盟的理论基础。

二、唯物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外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所谓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本质主义(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随着1990年代后结构主义思维模式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女性范畴的统

^① Gaard Greta, “Ecofeminism Revisited: Rejecting Essentialism and Re-Placing Species in a Material Feminist Environmentalism”, *Feminist Formations*, Vol. 23, No. 2, 2011, p. 32.

^② Nancy Fraser, “Behind Marx’s Hidden Abode”, *New Left Review*, Vol. 86, March – April, 2014, p. 1.

一性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似乎不仅将女性这一范畴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肯定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等式,将二者同等看待。无论人们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理解为生物学上的还是由社会和历史所构造的,这些联系在传统中一直是压迫女性的关键工具。女性主义曾竭力反对以下的观点: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因此更缺乏理性和文化修养,也更缺乏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能力。生态女性主义似乎想要通过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来反驳上述论点,然而,这些观点反而强化了父权制的统治。

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还与当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所固有的方法论本质主义有关。它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张和理论是如何在特定的西方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被建构和嵌入的。人们普遍指责它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针对第三世界女性的所谓自然的“嵌入性”的想象,并深化了“她们对自然具有更全面的理解”这类观点。^①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旨在解决社会不公的实践无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本身就是一种压迫。

唯物主义的生态主义者能够通过提出更有限的、经验主义的论证来避开这些陷阱。他们拒绝女性与自然之间精神的、抽象的和整体的一切联系,而强调女性在具体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的实际物质条件,从而避免了被指责为本质主义。基于如上这一重要的基础,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地区,女性只是在非常具体的、物质的意义上“更接近自然”。她们通常必须取用水和柴火,并负责维持生计的小规模农业,以确保家庭的生存,而这意味着她们往往是环境破坏的第一批受害者。

在为唯物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辩护时,嘉德和洛里·格鲁恩(Lori Gruen)承认环境恶化会影响到所有人,而不只是女性的问题。她们的论点是,这仍属于女性主义的研究范畴,因为女性和儿童要最先承受环境恶化的后果。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大约生产了世界粮食供应总量的80%,因此,女性受到粮食和燃料短缺以及水资源污染的影响最为严重。”^②她们的观点是,事实上没有必要从隐喻层面或者从本质主义层面认为女性更倾向于保护自然,因为女性生活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其参与环保运动仅仅是一种自卫行为。^③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在研究气候变化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女性,尤其是落后国家的女性,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与男性不同,她们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之一。一方面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较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们获得收入的机会较少……干旱的环境和不稳定的降雨迫使女性更努力地工作,以确保她们的家庭拥有食物、水和能源。”^④换言之,唯物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可以理解为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特定的女性群体通过她们与环境的日常互动,与环

① 关于女性主义针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及本质主义倾向的批判,参见 Bina Agarwal, “The Gender and Environment Debate: Lessons from India”, *Feminist Studies*, Vol. 18, No. 1, 1992, pp. 119–159; Rosi Braidotti, *Women,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wards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London: Zed Books, 1994; Meera Nanda, “History is What Hurts: A Materialist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Its Ecofeminist Critics”, in Rosemary Hennessy and Ingraham Chrys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Bina Agarwal, “A Challenge for Ecofeminism: Gender, Greening, and Community Forestry in India”, *Women & Environments International*, Vol. 52/53, 2001, pp. 12–15.

② Greta Gaard and Lori Gruen, “Ecofeminism: Toward Global Justice and Planetary Health”, in Michael E. Zimmerman, Callicott J. Baird, Karen J. Warren, Irene Klaver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4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2005, p. 163.

③ Mary Mellor,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Feminist Green Socialism*, London: Virago, 1992, p. 7.

④ UNFPA, “Facing a Changing World: Women, Population and Climate”,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9*,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state_of_world_population_2009.pdf, 2017–10–23.

境建立起独特的联系。至少在上述具体的事例中,女性主义和环保主义有明确的战略动机联合起来:保护环境也将直接改善贫困女性的生活。

这些基于背景和经验的论点在政治和战略上看似重要,却没有为生态女性主义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它们没有揭示性别压迫与环境破坏之间系统性的或结构性的联系,而仅仅是描述了它们当前的纠缠关系。环境问题往往会使现存的社会问题恶化,因为那些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源用来减轻这些问题。当人们对这种联系作出更系统的解释时,他们通常使用的是措辞模糊得令人沮丧的术语,这些思想往往又基于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支配。女性和自然之间历史性的和概念上的联合被认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一联合已经成为了父权统治正当化的一个重要理由:女性化的自然和女性的自然化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起到了使女性和自然处于从属地位的作用。

例如,格温·柯克(Gwyn Kirk)认为“在为资本积累服务的过程中,白人主导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创建了‘他者’;它压迫女性和自然,也压迫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种和穷人……这种持续的物化过程是基于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家的压迫系统的核心机制。”^①玛丽·梅勒(Mary Mellor)认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是‘九头蛇怪’的不同表现形式,它的触手勒紧了女性、穷人和地球的喉咙。”^②嘉德和格鲁恩曾写道“当前的全球环境危机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主义、帝国主义、物种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强化的结果”,这些意识形态最好被理解为“相互交叉的力场……创造了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加强的压迫制度”。^③

列举出必然会出现在社会整体之中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并指出它们之间的交叉或联系,显然是有效的。这些无所不包的解释可以

帮助女性主义者描述不同支配轴的交叉经验或实例。但是,这些经验或实例没有解释它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以特定的形式一并出现。^④如果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被视为已经涵盖了所有形式的压迫和不公,那么它就有可能丧失明确的理论焦点和政治目标。唯物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亲和政治”(affinity politics)的一个例子,是一种灵活的形式,能够在“地球的生存和平等的未来”这两个目标的背后容纳许多不同的理论和政治立场。^⑤

因此,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使我们能够识别出与资本主义系统逻辑相关的、并且将性别压迫与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的独特机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否定了性别本质主义所坚持认为的“性别压迫与环境破坏之间的联系具有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的观点,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它

① Kirk Gwyn, "Standing on Solid Ground: A Materialist Ecological Feminism", i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p. 349.

② Mary Mellor,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Feminist Green Socialism*, p. 155.

③ Greta Gaard and Lori Gruen, "Ecofeminism: Toward Global Justice and Planetary Health", in Michael E. Zimmerman, Callicott J. Baird, Karen J. Warren, Irene Klaver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4th edition), p. 170.

④ 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交叉性理论进行批判时,尤其关注这个问题。例如,莎拉·法里斯(Sarah Farris)认为,尽管交叉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很有说服力,因为它拒绝将种族和性别压迫视为次要的压迫形式的观点,但是它未能提供它所承诺的全面理论。参见 Sara Farris, "The Intersectional Conundrum and the Nation - State", <https://viewpointmag.com/2015/05/04/the-intersectional-conundrum-and-the-nation-state/>。有关交叉性理论的重要文献,参见 Kimberle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No. 1, 1989, pp. 139 - 167.

⑤ Carlassare Elizabeth, "Socialist and Cultural Ecofeminism: Allies in Resistance",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Vol. 5, No. 1, 2000, p. 101.

能够提供一个严格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这种联系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或意外。自然的女性化和女性的自然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具有意识形态正当性的统治逻辑,还通过性别化的社会经济实践和劳动分工来具体地构造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一旦我们能够认识到女性生育劳动的自然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性别压迫与环境破坏之间的系统性联系就会变得清晰明了。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在1970、1980年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对女性的生育和照顾工作展开了理论化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劳动形式,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揭示女性遭受剥削的机制。例如,关于家务劳动的辩论基本上都会涉及女性的家务劳动和生殖劳动是否应当属于生产性的工作并产生剩余价值的问题。然而,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分支,它侧重于强调原始积累。原始积累的概念更容易被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所接受,因为它关注的不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力,而是其必要的前提条件。它能够将产生重要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活动和资源纳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因而在结构上被排除在商品市场之外。

原始积累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从来都不是仅仅依靠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来实现的,而是一直严重依赖于直接的掠夺和盗窃。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阐述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原始积累是一个无偿占有或索取资源的固有的暴力掠夺过程,例如圈占公地、强制移民和奴隶贸易等。自然的支配和自然资源的开采可以被视作原始积累的另一例子:自然产生的使用价值被

掠夺用作生产消费品的原材料,并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循环中被视为商品。在历史上,殖民主义曾是这种掠夺的有效政治策略:从落后地区开采黄金、象牙和橡胶等资源,以供发达地区使用。

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前的一个历史过程,还是一个持续至今的过程,对此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论。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一个从资本主义外围到中心的财富转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最先出现。但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着重强调它的连续性、必要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联系。^②“持续的原始积累”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核心思想。例如,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和女性的生育劳动都作为一种免费的资源而被剥夺。密斯在资本主义的诞生、殖民统治、通过工业化使自然处于从属地位以及摧毁女性对其身体的自主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历史的和结构性的联系,而这正是欧洲实施的政治迫害的特征。如此一来,殖民地、自然和女性就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目标驱动下的同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被资本主义白人男性以一种结构类似的方式所支配、控制和暴力剥夺。^③

在欧洲的政治迫害期间,男性对女性的粗暴支配与资本积累同步地大规模上演。从那时起,欧洲社会就建立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77页。

② 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原始积累重新命名为“剥夺积累”。参见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埃里尔·沙里(Ariel Salleh)的作品也是奠定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基础的核心。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 as Politics*)一书中,她提出了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生态主义和土著民族反对跨国资本的共同政治目标。参见Salleh Ariel, *Ecofeminism as Politics: Nature, Marx and the Postmodern*, London: Zed Books, 1997。

关系的基础,即劳动力所有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非自由的、被强迫的女性或广义上的殖民劳动作基础,自由无产者的非强迫的和契约性的劳动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女性和殖民地人民被定义为财产和自然资源,而不是可以签订契约的自由主体。两者都必须服从于武力和暴力。^①

密斯用冰山的比喻来说明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依赖于暴力征用的过程:资本主义就像一座冰山,资本和有偿劳动以可见的方式被划归到官方统计的GDP之中,而女性的生育劳动、殖民地的劳动生产以及自然的生产则被排挤在官方统计的经济数据之外,从而形成了这座巨大冰山的水下部分。^②在意识形态方面,外部化的基本流程是将女性和殖民地的归化“合理化”——他们被定义为不受控制的、危险的、野蛮的和可征服的。^③“在过去的四、五个世纪里,女性、自然和殖民地不仅被外部化,而且被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被推到社会的底层,就像冰山的水下部分一样被忽视了。然而,冰山的水下部分却构成了冰山的基础。”^④这种外部化过程的基本原理是很简单的:它允许资本家拒绝支付他们原本必须要承担的成本。当女性和殖民地人民的劳动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时,它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可以免费获取。^⑤

密斯认为,现代社会仍存在着与早期资本主义相同的征用过程,因为这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结构性的需要。对女性而言,特别是对于生活在落后地区的女性而言,应当根据原始积累的逻辑去理解她们所遭受到的普遍存在的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而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先决条件。密斯曾对奴隶和性交易等公开的现象和其他更复杂的现象(例如邮购新娘、血汗工厂的劳动力和性旅游产业等)进行举例说明。

弗雷泽最近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她也强调

资本主义掠夺的再生产过程及其必要性,即资本主义的掠夺不是通过资本购买劳动力、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契约关系来运作的,相反,是通过没收生产能力和资源并将其征召到资本的价值循环中实现的。“没收可能是明目张胆的暴力行动,就像对待新大陆的奴隶一样,它可能通过商业的外衣进行掩盖,就像今天的掠夺性贷款和债务止赎一样……没收的资产可能是劳动力、土地、动物、工具、矿物或者能源物质,但也有可能是人类及其性能力和生殖能力、其子女和身体器官等等。”^⑥因此,尽管一些主体有权进入劳动力市场,有权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并有能力在市场上竞争,但他们终究只是被剥夺了自己的身体、土地,甚至是生命的一次性工具而已。与性别问题相交织的种族分化已经成为并且将继续成为划定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的关键性工具。^⑦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除占有由雇佣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外,还依赖于对女性、土著民族、非人类的动物和生物圈的持续的、暴力的掠夺。因此,对女性生育劳动的征用在结构上类似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而且这也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发生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包括今天的一定程度上,女性在暴力的胁迫下放弃了对自身身体

① Maria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Zed Books, 1998, p. 170.

② Ibid., p. 11.

③ Ibid., p. 90.

④ Ibid., p. 77.

⑤ Ibid., p. 110.

⑥ Nancy Fraser, “Expropri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Racialized Capitalism: A Reply to Michael Dawson”,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 No. 1, 2016, p. 166.

⑦ 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认为,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必须先理解以种族作为区分的优等人类与劣等人类之间的本体论区别,这是奴隶制、殖民主义、美洲的土地盗窃和种族灭绝的前提。参见 Michael C. Dawson,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Note on Legitimation Crises and The Racial Order”,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 No. 1, 2016, pp. 143–161.

和生育能力的自主权,这些能力和与之相关的劳动被免费地从她们身上掠夺过来为资本积累服务。这个过程被本质上的意识形态过程所掩盖和合法化。这种意识形态过程使女性“自然化”,认为她们自身本来就是不那么文明和理性并且更接近自然的。

然而,将女性受压迫与生态破坏联系起来的理论性或系统性的基础主要来源于实际,而非意识形态。女性与自然在被征用的机制中都具着有相似且不可或缺的作用,她们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中占有类似的地位——剥削机制正是以无形的征用为基础。换言之,女性和殖民地不仅被认为是“自然的”,而且对他们的征用也被视为是“自然的”。

四、自然的资本化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如密斯,通过在资本主义、性别压迫和生态破坏之间建立起一种系统的联系,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夺程度。这样的描述使得在同样的系统性逻辑下,将“政治迫害、殖民主义、露天矿坑和性旅游产业”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成为了可能。但缺点在于,我们最终得到的将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理论。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对这个框架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更新,以使其更加精确。

除了需要辨别和分析资本主义进行剥削、降低成本以及“搭便车”的动机外,还有必要识别出资本主义的两种内在倾向,这两种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将自然和女性的生育劳动纳入其价值循环的方式:将自然的商品化作为自然的本质以及自然的实际从属。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机制有时会相互加强,但有时又相互背离。

识别这些额外机制应当被视为对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们的回应。正如许多理论家所言,今天的资本主义比起当年在

18、19 世纪衍生出了殖民主义且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更具流动性和灵活性。^①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新自由主义作为主要经济模式的兴起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的商业化。

(一) 自然作为自然的商品化

根据密斯等人的观点,资本主义掠夺自然(包括女性的生育能力)的关键在于“搭便车”:它无法为此支付账单。自然作为一种无成本的资源而被外部化,它被默认为是无限的,可以被无偿地征用。正如杰森·摩尔(Jason Moore)所言,大自然的“免费馈赠”不是“唾手可得果实”。原始积累理论有效地揭露了“廉价的自然资源”是如何产生的,它们都是通过暴力和破坏性的手段而被征用的,例如奴隶制或露天矿坑等。^②

然而,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别显著的趋势却与上述情况恰好相反,它试图将越来越多的活动和资产内部化于资本主义市场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由于GDP是用市场交易额来衡量的,所以市场化便是加速经济增长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手段。因此,尽管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识别出典型的外部化过程——例如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但我们还需要识别出那些企图将自然环境更充分地内部化于资本主义市场之中的机制。尽管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仍然存在着可供风险资本家们探索和征用的所谓的“处女地”,但是这样的外部环境在今天已经很难寻觅。风险资本主义被迫采取了更具想象力的新途径。

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他指出,我们目前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与自然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

① Meera Nanda, “History Is What Hurts: A Materialist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Its Ecofeminist Critics”, i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p. 366.

② Jason Moore,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Verso, 2015, p. 64.

变化,自然的资本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主义视域下的自然一直被视作商品,而自然所提供的使用价值则一直被掠夺来满足生产性的消费。但现在,一系列全新的“生态商品”已经出现。史密斯写道“传统的自然商品通常仅涉及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材料的使用价值,例如,用来生产桌子的木材,用来生产能源的石油,用来生产钢铁的铁矿石,用来生产面包的各种谷物等,但是,新一代的商品却是截然不同的。”^①现代资本主义针对生态商品,如碳排放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指标,自相矛盾地将它们原本被视作自然商品的属性又恢复为自然物的属性,进而将它们划归到资本征用的外部物品之列,又赋予它们以交换价值,并最终使它们内部化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商品所产生的价值——例如,一个地区的热带雨林能够抵消一定量的温室气体——正是取决于上述事实:这片雨林在当地无法被有效地利用。“成片林地的土地所有者(一般位于较落后的热带国家)将可以通过承诺不砍伐树木而获得报酬。与此同时,那些来自工业发达地区的、主要的环境污染者则可以通过购买污染排放指标而获得继续污染环境的权利。”^②

鉴于此,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一个双向运动:资本在通过排放污染物使成本外部化的过程中,也在为其他公司(有时甚至是同一家公司)通过内部化机制实现资本积累提供了机会,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交易污染物排放指标。因此,资本主义在掠夺环境的过程中,相对灵活地利用了内部化和外部化的机制,并依赖于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促进经济增长。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机制都经不起推敲。资本主义搭上自然的“便车”显然是有问题的,但为了实现环保的目的,把自然环境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则面临更严重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一个自我调节机制运作良好的市场体系中,环境所产生的外部性

很难被完全地内部化。环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可以被生产出来,相反,它是一个复杂且完整的整体,包含着整个生物圈。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言,为了使环境能够内部化于市场体系,复杂的生态系统必须首先被分解成不同的商品或服务,例如空气质量、特定种类的动植物、维持全球温度等。随后,需要通过构建供求曲线来估算特定部分的价格。然而,定价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按照“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ing),消费者的偏好是由与环境商品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确定的;然而,如果依据“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则应当首先假设市场已经被构建完成,然后再通过调查的方式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经济学家可将这些调查得出的结果汇总起来,以构建出环境商品的需求曲线。最后,还需要建立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以改变现有市场价格或创造新的市场。但是,由于上述所有阶段实践起来都相当困难,因此在保护环境问题上——即使在市场的逻辑之内,市场也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③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内部化机制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例如,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指出,市场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分配商品和服务,它也是被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的意义、价值和态度得以表达和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内部化机制,环境变成了一套独特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用工具,其价值由人类个体中的利己主义消费者的偏好所决定。因此,在哲学层面上,资本主义的内部化机制不仅存

① Neil Smith, "Nature As Accumulation Strategy", *Socialist Register*, Vol. 43, 2007, p. 17.

② Ibid., p. 19.

③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p. 27 - 28。此外,关于欧洲碳市场的严重问题,可参见 Naomi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pp. 224 - 225。

在技术上难以通过调查方法确定正确的价格的问题——在这个维度上,我们难以保护那些未被赋予适当经济价值的环境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些评估方法无法计算出保护环境的内在价值。^①

我将列举一个来自我的祖国芬兰的例子。本届芬兰政府打算通过投资生物能源来实现欧盟的能源和气候目标。然而,批评者指出,由于该政策的实施依赖大量的林木砍伐,因此该政策将会削弱现有森林碳汇(carbon sink)的能力,导致全球气候进一步恶化。在随后的辩论中,支持政府的观点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砍伐原始森林中的古老树木并种植新的、能够快速生长的树木来实现既不减少碳汇又能增加森林砍伐面积的目标。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建立精细化的种植管理系统,使这些新种的树木有效地发挥碳汇的作用。不管这一说法正确与否,这个例子足以表明:在这一框架下,原始森林的古老树木以及生物多样性是毫无价值的。它们之所以会遭到破坏,不是因为它们被排斥于旨在保护环境的市场机制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被纳入到了这一市场机制之内。^②

当我们认识到自然环境和女性的生育劳动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具有相似的地位时,我们就可以确定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女性的生育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它与最近所发生的试图将私人领域商品化和把女性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努力相一致。最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迅速兴起,这导致女性作为家庭护理提供者的传统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过去女性在家中所从事的情感和护理方面的活动现在正逐渐转化为有偿服务,例如托儿服务、家政服务、医疗服务等。换言之,现代女性的生育劳动并没有从商品市场上被外部化到私人领域,然后被无偿地征用,反而日益被内部化于资本市场之中,并作为生产劳动被加以利用。这导致了新的性别压迫形式的出现:贫穷

的、少数族裔的移民女性现在在提供商品化的护理服务。所谓的“全球照护链”(global care chain)的形成和被贩卖女性数量的增长已经构成了这种发展的性别效应。^③

这种女性化的服务经济的出现也与当前的“护理危机”有着内在的联系,目前社会上缺乏足够数量的合格护理人员来提供真正的护理服务。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指出的那样,与环境的情况类似,护理服务形成了重要的、正面的外部性,然而,这些外部性无法在市场交易中完全体现出来。这种观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护理工作商品化的局限性。正如经济学家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和朱莉·A. 纳尔逊(Julie A. Nelson)所言,孩子们被培养成负责任、有技能和有爱心的成年人后,社会上许多人都能从中受益。具体而言,雇主受益于有技术和有团队精神的工人,而老年人也能受益于技术熟练的年轻工人所创造的高税收。^④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些收益无法完全地被创造它们的人所获取。例如,父母不能向雇佣他们成年子女的雇主索要费用。这意味着,与其他外部性相似,由护理所产生的外部性会对“搭便车”行为形成激励,让其他人来支付成本。福尔布雷和纳尔逊的结论是,单靠市场无法解决当前的护理危机,“在缺乏集体协调的情况下,社会所能提供的照护服务数量将少于最佳值,因为照护服务的提供者未能就其创造的社会价值获得充分的

① Michael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2.

② Hanna Aho, "Lyhyt Oppimäärä Metsien Rooliin Ilmastopolitiikassa", <https://www.sll.fi/ajankohtaista/blogi/lyhyt-op-pimaara-metsien-rooliin-ilmastopolitiikassa>.

③ Arlie Hochschild, "Global Care Chains and Emotional Surplus Value", in 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eds.), *On the Edge: 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0.

④ Nancy Folbre and Julie A. Nelson, "For Love or Money—or Bo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No. 4, 2000, pp. 123–140.

补偿……家庭和市场供应之间的可替代性是有限制的,我们的社会需要讨论、定义和处理这些限制”^①。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找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将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与性别劳动分工联系起来的方式——资本主义希望女性既能工作,又能呆在家里。我们今天可以找到体现这两种动机的实例。资本主义期望通过女性无偿照顾家庭从而使生育劳动的成本外部化,又通过创造护理工作的新市场使其内部化。这与环境问题相似,而且这两种选择都是有问题的。当生育劳动不能商品化时,就会产生“搭便车”的问题;然而,当它变成有偿服务时,又将面临护理危机的挑战。^②正如我将在结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上述情况表明,仅仅通过攻击新自由主义以支持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形式的做法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中的性别压迫或环境破坏问题。要解决这两大问题,必须依赖更为激进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并与资本主义本身的核心逻辑展开斗争。

(二) 自然的实际吸纳

除依靠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突显出来的内部化机制外,资本主义针对自然所实施的“搭便车”的征用机制还必须以一套独特的自然的资本化机制作为辅助。这些机制通过使那些(基于生物的)自然资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或者更加适用于商业开发,从而达到操纵和加强生物生产力的目的。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斯科特·普鲁达姆(Scott Prudham)和瑞秋·舒曼(Rachel Schurman)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以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将这种机制理论化,并将其视作自然的“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博伊德和他的同事们受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和“实际吸纳”的概念的启发,提出了自然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的概念,以便区分资本主义侵占自然的两种不同方式。

自然的“形式吸纳”大致上对应于前文围绕密斯的研究工作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或原始积累机制。在自然的“形式吸纳”的语境下,资本主义企业试图占有或控制自然资源,但是它们“无法以增强、控制、操纵或其他‘改良’自然的方式来达到目的”^③。资本依靠一种攫取的逻辑来运作,并且将自然世界视为由一系列固定的生物物理过程和物质特征所构成。尽管这种方法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同时,它通常也意味着企业必须通过调整生产策略来解决自然的问题,从而阻碍了资本积累。例如,对自然生产计划的依赖有可能对劳动力和生产机器的持续部署构成严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发展自然的“实际吸纳”机制变得至关重要。

自然的“实际吸纳”是指这样一种战略:资本试图通过人为地改变生物物理过程以达到克服生产障碍、获得竞争优势和增加盈利能力的目的。攫取的逻辑被致力于提高生物生产力的逻辑所取代,“其所追求的结果……是更高的产量、更短的周转时间、更好的抗病性等。简言之,改造自然是为了让它更快、更好、更努力地工作”^④。

人们可以在林木行业再次清晰地看到自然的“形式吸纳”与“实际吸纳”之间的区别。与芬兰的例子类似,大量砍伐原始森林并焚烧林地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而现如今的企业和国家机构则旨在干预森林生长的生物学基础。“与将树木视为‘现成的’对象不同,人工林业的逻辑涉及对树木生长过程的持续干预

① Ibid., p. 137.

② 对女性个体来说,这意味着她们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会越来越多地因相互矛盾的女性要求而左右为难。参见 Johanna Oksala, “The Neoliberal Subject of Feminism”,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Vol. 42, No. 1, 2011, pp. 104–120.

③ William Boyd, Scott W. Prudham and Rachel A. Schurman,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the Problem of Nature”,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No. 7, 2001, p. 562.

④ Ibid., p. 564.

和改变。”^①林木行业不再只是砍伐树木和攫取木材,而是包括了化肥和农药的投放、集中化的苗圃作业、人工或机械化的树木种植作业以及试图直接操控遗传物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②

虽然资本针对自然实施的“实际吸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却为自然的“实际吸纳”的扩张和集约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在当今的生物资本主义的视阈下,生物技术被视为可用以解决气候变化、廉价能源枯竭和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阻碍资本积累的问题的手段。自然的“形式吸纳”只需要构造自然资源的产权属性就足以提高盈利能力,自然的“实际吸纳”则更多地依赖于生物科学技术的私有化和商品化,而非自然本身。^③换言之,现如今要想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力,就需要借助复杂的生物科技。^④

如果此时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与之同时发展的女性生育劳动的资本化,那么自然的“实际吸纳”又意味着什么呢?需要指出的是,辅助受孕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利用女性生育劳动的机会,因为这些技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育的生物过程。一直以来,女性的生育劳动都从未完全地从资本主义的价值循环中脱离出来,例如,蓄奴的做法被光明正大地标榜为扩大奴隶主的财富和劳动力的手段。^⑤但现在,辅助受孕技术的出现赋予了人类改变自身生育的生物物理过程的能力,从而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全球生育市场。目前我们很难准确地估算出它的整体规模,但即使仅作谨慎保守的估计,那也是十分惊人的。有学者指出,仅跨国代孕的全球市场规模就可高达每年60亿美元。^⑥

辅助受孕技术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育过程,从而使生殖与性行为、血缘意义上的母亲以及怀孕的过程完全分离。对生物的繁殖而言,两性之间的自然受孕行为不再是必要的,因为依靠体外受精技术和宫内授精技术就

足以完成受孕。这些技术的商业化意味着,如果有生育意愿的夫妻不具备生育能力,那么他们可以通过具有市场准入资质的中介机构购买精子和卵子。无论是母亲的卵子还是捐赠者的卵子,都能与父亲的精子或捐赠者的精子结合受精。如果血缘意义上的母亲无法保障胎儿足月妊娠,可以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由代孕母亲保障胎儿足月妊娠。这一过程以生物技术为载体,并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中介组织起来。商业诊所将筛选和雇用代孕母亲,并为胚胎移植准备子宫内膜,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冗长的医疗程序和复杂的医药制度。

因此,作为代孕者的女性的身体和生育能力体现出资本的属性,而非外部化的自然资源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代孕行为可以被看作是资本对自然的“实际吸纳”,资本能够控制和改造生物的繁殖规律,并将其塑造为用于创造新的市场和新的资本积累的资源。代孕的个体被视作可开发的自然资源而被有效地生产出来,并被转化成为复杂的生物技术流程中的一环,以及资本主义价值循环中的一部分。因此,与大多数女性的生育劳动不同,代孕者的生育劳动是完全资本化的。

① Ibid., p. 566.

② Ibid.

③ Ibid., p. 564.

④ 基恩·伯奇(Kean Birch)和大卫·泰勒菲尔德(David Tyfield)认为,现如今生物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产权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权。通过市场交换的形式,从无形资产中兑现价值是该行业盈利的关键性问题。参见 Kean Birch and David Tyfield, “Theorizing the Bioeconomy: Biovalue, Bio-capital, Bioeconomics or ... Wha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 38, No. 3, 2012, p. 316.

⑤ Angela Y. Davis, “Reflections on the Black Woman’s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Slaves”, *Massachusetts Review*, No. 2, 1972.

⑥ Mohapatra Seema, “A Race to the Bottom?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the Rapidly Growing Global Surrogacy Market”, in Sayantani DasGupta and Shamita Das DasGupta (eds.),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urrogacy in India: Outsourcing Lif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p. 147.

五、反对资本主义的 女性主义生态政治

本文认为,当前,女性主义只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才能形成其批判视角。生活与政治之间的全新关联同资本主义积累的扩大密切相关。如果不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就不可能理解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正如我们如果脱离生物资本主义的分析,就不可能理解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生物技术中的应用。因此,本文所提倡的女性主义理论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对于女性主义理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系统地看待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逻辑和运行规律。在宏观经济层面,重点是资本积累的首要目标或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在微观经济层面,重点是个体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必须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目标进一步解释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品创新等行为的必要性。

尽管大多数资本主义理论家都同意:上述所谓的“必要性”可以根据其所处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进行重构,并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形式;但是,它们被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施加了明显的限制。这也是它们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原因。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点将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以便理解许多政治问题,例如全球代孕市场——“如果天气足够晴朗,那么印度的代孕诊所也不会遍地开花。”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理论不能在静态的或整体性的资本主义概念下运作。针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足够细致,才能够区分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机制,尽管这些机制与资本主义积累在深层逻辑上是相容的。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区分外部化与内部化的机制以及对自然的“形式吸纳”与“实际吸纳”,

从理论上更加详尽地解释资本主义对女性生育劳动的占有与自然生产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似性。然而,本文的主要动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从政治的层面看,充分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动态性与矛盾性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其中的一些机制在短期内似乎对女性、环境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可否认的好处,但是这并没有否定女性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的根本重要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为何女性主义与环保主义之间的政治联盟并不仅仅属于亲和政治。亲和政治可以共享不同的政治目标,与之相反,本文在总体上主张,女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有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首先,他们都面临同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那就是质疑前文所述及的“市场内部化与外部化过程之间的界限依靠政治谈判的方式来确定”的问题。例如,代孕的例子表明,当前一个关键的政治问题是,不同生物的生命或自然过程是否已经被纳入到市场范围之内,它们的适当位置是否已经被排除在市场范围之外?这将直接关系到平等准入和民主政治控制这类紧迫的政治问题的进程,而且对赋予这些进程以价值和道德意义也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例如,可以通过生物技术生产出来的某类东西并不意味着应该被作为商品进行出售。在讨论某项事物的商品化的限度时,需要从伦理和哲学的角度对市场加以限制,这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

其次,自然的“实际吸纳”引入了诸如风险、权利和责任等棘手的政治问题。自然的“实际吸纳”包含了新兴生物技术的应用,并隐藏着这样的问题:这些技术包含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以及不可估量的环境和医疗后果。这些风险可能是新型生命形式,例如超级杂草或超级病毒、细菌的毒株逃逸或扩散的风险,也可能是由于注射激素所导致的卵巢过度刺激或强制剖腹产所导致的医疗并发症等风险。这

些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的风险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政治问题,例如,由谁承担风险以及由谁承担赔偿责任。与此同时,这些问题也意味着女性主义和环保主义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以开展反对生物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

最后,商品化的限度与对自然的生物物理操纵的风险这两个问题必须成为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政治问题。如果本文的分析无误,鉴于目前的经济体系无法正确认识“外部性”价值的现状,那么女性主义和环保主义应该都有兴趣对它展开挑战。尽管女性主义学说和环境经济学说均已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在这些研究领域内又都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环境和女性的生育劳动均具有内在的价值,不能完全被货币化,也不能完全被内部化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循环之中。这就意味着,它们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体系中将继续被低估和掠夺。当我们发自内心地思考地球的经济价值是什么、我们愿意为孩子的生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问题的时候,试图将无法计量之物货币化的荒谬性就会变得显而易见。因此,女性主义生态政治必须从意识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思想出发,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利润、消费者偏好和经济增长,还有其他价值有可能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21世纪的女性主义者对环境政治的坚持将不复存在,这种坚持仅仅是试图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外保持一种外部性。相反,她们的目标必须变得更加激进,她们必须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挑战那些试图将生命纳入到价值循环中的各种机制。本文所设想的女性主义生态政治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对自由市场的管制和对资源更公平的再分配等内容,而这些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诉求。但很显然,我们无法将该政治计划归纳到传统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范畴之中——女性主义生态政治无法针对劳动观念、经济解放、阶级斗争或生产主义等意识形态展开包容性运动。现在,

人们质疑资本主义的原因不再仅仅是基于我们与他人的剥削性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是基于我们对非人类世界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破坏。■

[乔安娜·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林策: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译文校对 朵悦)

(责任编辑 徐焕)